

■ 历史真相的泥淖

# 历史真相的泥淖

[克]弗拉尼奥·图季曼 著  
达 洲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 ■ 第三部分

# 哲学和历史罪恶

# 一、人类理性关于暴力实质的苦恼

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世界历史，看到的都是一幅由凶残、疯狂和灾难织成的挂毯。

——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斯(1728—1774)

最好的历史是已经发生的历史(因为没有别的可言)。

——哥·威·莱布尼茨(1646—1716)

## 1. 神话的和宗教的反思

激起你的怒火，倾泻你的愤慨。摧毁对手，肃清敌人。让他知道，能拯救他的是熊熊烈火。让伤害你的人民的人面临摧毁。

——《〈圣经〉次经西拉书》

人的理智从知道自己存在时起，就为暴力存在所占据。20

世纪中叶被称之为种族灭绝的行为从我们原始的史前期开始时就存在。在人和民族的历史进程中,暴力是一个始终存在的现象,是人生死存亡的原因和前提。人在改变那些制约着人和民族的命运的诸种矛盾的永恒斗争中面临的是暴力无法避免的存在。这些矛盾就是生与死,善与恶,爱与恨,和谐与冲突,和平与战争,对一切美好的东西的欣喜,对一切残忍的行为的恐惧。

从时间一开始起,人的历史思维就一直处于这样一种矛盾状况之中。我们意识到创造与破坏这两种本能是相互依存的,但是,我们又无法消灭这两种本能。每当人的思维企求超越善与恶,它就失去了与坚实的大地的接触,离开了历史实在,进入天堂般的狂喜,进入另外的世界,或者进入永远处于无法达到的地平线上的某种和平的未来。

每一个暴力行为都是仇恨的产物,而仇恨是与爱心相对立的。然而,仇恨也是跟爱心十分接近的。在许多方面,仇恨是爱心不可分割的另一面。根据《圣经》,上帝创造人类是创造应当生活在爱心中的兄弟。但是,出于嫉妒的仇恨使得人类第一代就出现了谋杀者。自那时起,世界就一直是仇恨和暴力的牺牲品。正如该隐反对亚伯,以扫反对雅各,雅各的儿子们反对约瑟一样,还有埃及人反对以色列人,外邦人反对耶路撒冷。上帝选民的敌人就是上帝的敌人,等同于罪犯,他们使得仇恨和以色列的圣战变得有道理。在以色列人民的一切敌人也应当被看成是上帝的敌人这种理论支持下,“你应当爱你的邻居,恨你的敌人”这一原则必然导致为暴力辩护。这样一来,满怀爱心的上帝也被模棱两可地描绘成充满仇恨的上帝,他恨敌人、暴君、一切罪人,不论是个人,还是整个民族。这样一来,犹太人的圣经思维把上帝变成为了以色列而杀死埃及人头胎婴儿的可怕的斗士。他要求彻底消灭,也就是说彻底摧毁敌人,摧毁活着的人和物质

财富。于是屠杀被征服的敌人就成了圣战的宗教规则之一，而未能消灭敌人，便是亵渎神明，会招致惩罚，即招致失败。

在暴力时代环境中产生的圣经思维只把反击力量看成是对被压迫和受威胁的人民的拯救力量：“愿强暴的人被祸患消灭！”这种思维认为圣战是消灭世界上罪恶的手段。尽管圣经思维赞同复仇和采用破坏性力量，但还是谴责不正当的暴力、驱散居民、屠杀孕妇、把人当祭品、把婴儿往岩石上撞击和压迫新来者。

圣经承认，一切征服战争，包括以色列的圣战，都引起新的战争。圣经认为，正义的一方未能打败的敌人将因自己的邪恶而遭惩罚。战争和暴力引起的道义上的不安和精神上的疑虑，是无法逃避的。虽然和平是上帝的意图，经验表明，每一个民族只有付出通过战斗和暴力获得胜利的代价才能得到和平。

鉴于种族灭绝的暴力不仅可能产生于征服的愿望，而且也可能产生于复仇心理，圣经思维允许复仇达到重建公正和战胜罪恶的程度。可以为被践踏的权利雪耻，但是不准出于仇恨作恶的人而实施报复。为了遏制复仇的本能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犯罪，进行报复的责任和权利逐步从个人转移到社会大家庭，最终转移到上帝，上帝被视为唯一公正的复仇者。作为无所不知者，只有他才能成为公正的法官和复仇的合法执法人。复仇观念从血淋淋的复仇要求发展为放弃报复，因为“进行报复的人，主也会对他进行报复”。

《新约》决没有完全拒绝暴力。《新约》承认有必要进行斗争，例如，基督要对付不信教的人，捍卫他的圣城，但是《新约》也谋求赋予斗争的意义。尽管基督本身成了盲目和愚蠢的仇恨的牺牲品，《新约》提出了憎恨罪恶而不憎恨人和民族的原则，甚至宣扬要原谅仇敌和爱仇敌。上帝的天国不是靠地球上的力量，而是靠神的力量建立起来的，“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敌对是

一种魔鬼般的神秘之谜，而不光是一个事实，但是，正是爱的精神，而不是复仇的精神，把敌人变成友人。在个人生活中是这样，在民族生活中尤其是这样。

不过，痛苦仍然存在。那些蒙受苦难的人，那些鲜血四溅的人，虽然持原谅态度，仍然向上帝呼喊：“神圣而信实的主宰啊！什么时候你才审判地上的人，为我们所流的血伸冤呢？”历史上有众多的事例表明，自我牺牲和强迫和解产生的是仇恨和暴力更加严重的迸发。

在东方的一些著名宗教的早期思想中，可以发现对于牺牲和暴力的实质的看法跟《圣经》的看法相似，尽管这些宗教的世界观与基督教的教义有很大不同。

在婆罗门教最古老的时期，从公元前10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因陀罗是四个主神之首，主司雷雨、生育和战争。在包含婆罗门全部智慧的印欧时期最古老的文字历史巨著《吠陀》四部经典中，有整整一部阐述牺牲的礼仪，目的在于加深对“雷神和战神”的崇拜。它还认为，为了“净化”国家，为了社会的健康和财富而让人舍身是合理的。在婆罗门教中，也可以发现含糊不清的教诲：每一个善行或恶行都支持“生命圈”，也即指生与死的不断轮回。

佛教大概在公元前6世纪时接受了这一思想。佛教在亚洲不同的国家具有十分不同的特点，这取决于这些国家各自的宗教传统。人们经常指出的一点是，佛教教诲人们，人的命运是预先确定的，只有在远古神圣虚无的极乐世界，通过戒绝世俗的活动才能赎罪。然而，这只是佛教的一个方面。佛教有几种十分不同的传统。在西藏的密宗佛教的神话形象中，可以看到一位至尊的法师，一手持做仪式用的短剑，另一手持一个盛满人血的

容器，向湿婆——头上戴着人的骷髅制成的王冠的公牛——挑战。<sup>①</sup> 他的嗜血的性格还通过同他的配偶沙克蒂<sup>②</sup>的一个引起性欲的动作来表达的，这个动作是由一个作为祭品的人和他的力量的象征的一头公牛来完成的。这位法师的门徒们认为这个动作令人惊奇，而另一位法师，一个聪明人，则陷于痛苦的沉思之中。

值得指出的是，在印度教的神话里，湿婆成了主神，具有本质上相同的品质——是世界的创造者和摧毁者（与梵天和毗湿奴组成至尊的三位一体）。印度教不止是一种宗教，它还是一种无所不包的哲学世界观，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古印度的英雄史诗《摩呵婆罗多》。<sup>③</sup>

这部史诗的主题是帕勒德<sup>④</sup>王室两支之间为争夺统治而展开斗争，这场斗争转变成了民族战争。尽管佛教消极地听命于命运，佛教从来与压迫产生的暴力是不调和的，也不放弃对暴力的使用。这一史诗中，对战战兢兢的人民发出的“母亲的诅咒”，深深打动人心：“我可怜的民族，你们让我们的敌人高兴，你们不是我的孩子，也不是你们父亲的孩子。你们是谁的孩子？你们

① 原文如此。湿婆为婆罗门教和印度教主神之一，即毁灭之神、苦行之神、舞蹈之神。湿婆的形象是有五个头、三只眼、四只手、手中分别拿着三股叉、神螺、水罐、鼓等，头上有一弯新月作为装饰。他的坐骑是一条大白牛。

据说藏传佛教中有一护法神——大威德神，其形象如文中所述。——译者

② 沙克蒂为印度教性力派所崇奉的性力派女神。——译者

③ 《摩呵婆罗多》（一译《玛哈帕腊达》）印度纪元前 200 年写成的梵文叙事诗，意译为“伟大的婆罗多王后裔”，描写班度和俱卢西族争夺王位的斗争，与《罗摩衍那》并称为印度两大史诗。——译者

④ 印地文中帕勒德为“印度”之意。——译者

像阉人那样缺少怒火，那你们又怎能把自己看成是人类的一部分？……你们为什么像尸体那样躺着，像是被闪电击中？起来，你们这群胆小鬼；打了败仗后不要睡觉！不要可怜地退缩；显示你们的勇气！起来发出怒喝声！”因为如果你们“想保住你们的生命”，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你们“像火炬那样熊熊燃烧吧！”

当然，这样动人的号召，为了自我保存而拿起武器，在《旧约》的诗篇中，在“歌中之歌”中，在圣经其他口信中，在以赛亚宣扬民族良知和民族意识的言论中，在大卫对在吉尔博阿山上倒下的英雄们的悲歌声中，特别是在耶利米哀悼他的人民的失败的悲歌声中，都可以找到。圣经的这种哲学以及一切古代的神话思维，通常并不掩饰自己的意图是通过无情地消灭别国人民来证明本国人民的存在。

这方面的某种例外可以在从华夏土地上产生的最早的儒教中找到，儒教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孔夫子的哲学思想，他的目的在于进行根本的社会改革。目睹在封建小国和腐败政府的暴政之间的冲突所带来的战争和暴力的种种罪恶，孔夫子宣扬在和平、正义和非暴力的普通秩序下将实行的道德原则。他相信人原本是善的，他相信统治者的历史作用，但是他又提醒人们注意“君子之德风，小民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sup>①</sup>而不论这些统治者是谁。孔夫子主张中庸，主张避免暴力和一切极端做法。他教导的“金科玉律”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本质上与基督的原则是相同的。而且最初它的命运也是相似的：受到残酷的迫害、书被焚烧、自相矛盾的阐释、哲学思想变成了一种得人心的教条的宗教以及孔夫子本人从一个哲学家变成了一个神，甚

① 参看《论语卷六·颜渊第十二》。——译者

至向他奉献供品。然而他的教诲也被不断阐述,这使得儒教成了中国人民精神生活中直到今天为止最根本的成分之一。这也以一种方式证明,人的理智最古老和最有洞察力的思维无法消灭暴力。

在世界上最年轻的大宗教伊斯兰教确立了地位的一些地区,暴力的作用甚至更大。《古兰经》认为“全体人民组成一个民族”,人类分成部族和民族并不妨碍他们的兄弟情谊。但是,它还教导个人和民族都被要求考虑自己的功过。对“不信道的人”发起“圣战”,对于伊斯兰教信徒来说,不仅能得到地球上统治的好处,而且是得到在天堂的永生的最佳途径。《古兰经》命令它的信徒们,“坚忍不拔地”对待“地狱中的”“不信道的人”并要“严厉地对待他们”。穆斯林征服者的战事通常对被入侵、被征服的国家的整个居民施加无情的暴力。

虽然在穆斯林国家也出现了理性主义的思维,仍保留了哲学思考,不过大部分是在神学的范围内。值得注意的是,三大一神论宗教中最年轻的伊斯兰教从它7世纪问世以来,对于它从中脱胎而来、又与之共性最多的犹太教和基督教一直显示出敌意和不容异说的态度。

## 2. 古代的哲学推理

一切存在于冲突的基础之上…… 战争是万物之父,  
是人人之王。

——赫拉克利特

## 败者该遭殃！（Vae vicis！）

——罗马民谚

在古代史中，可以看出人对于暴力的意义和目的是持怀疑态度的。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可以发现人类一切后来的深刻思维的基础。已经消失的文明的历史洞察力就是以这种方式传给我们并且继续存在的。

希腊的复仇女神在古希腊的神话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她是支配男人的命运，支配男人生活和与其他人分享命运的社会的女神。复仇女神是希腊人下面这种看法的体现：只有通过维护非正义和犯罪，法律和秩序才能在人们和民族之间建立起来。荷马在他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提供了特洛伊战争（公元前12世纪）时希腊的神话思维和历史实在的图景。《伊利亚特》描述的只是结成联盟的希腊各城邦和特洛伊人之间那场10年战争的一个短暂时期。在这场战争结束时，希腊人犯下了无疑是种族灭绝性的罪行，而这一罪行又被颂扬成辉煌的胜利。希腊人在通过狡猾的欺骗拿下特洛伊城之后，把该城彻底焚毁，除了少数逃跑的人之外，把该城的居民统统杀死。虽然荷马把这些历史事件归之于命运，归之于是由纺织和割断人的生命和历史事件之线的命运女神三姐妹的意愿和行动，人的活动被说成是由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整体的一部分，甚至诸神也是这种命运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他们也参加了战争，分成两个敌对阵营。在这里，强者的权利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必然的事情。正如在大自然，“风吹落树叶”，而新的树叶又可能长出来一样，人也有同样的命运。荷马说，“有的人成功了，有的人遭殃了。”

在《伊利亚特》里还可找到对于过度的报复的颂扬。愤怒的

阿喀琉斯在普特洛克勒斯的尸体面前发誓，要“杀死特洛伊的12个儿子”来为他报仇。不过，荷马的世界致力于在善与恶斗争时使正义获胜，以求得进步和使世界更加和谐。

大约一个世纪之后，古希腊诗人赫西奥德把宇宙看成是对立面的斗争，是通向和解的道路。强者的实力用来推行秩序，宙斯的“英雄之人”就是一种“神授秩序”，他们赞成战争，“彼此错杀”。然而，从赫西奥德的永恒的忠告——“给别人施恶的人，别人也会给他施恶”来判断，对于人类来说，没有摆脱罪恶和不幸的出路。

迪奥格内斯·累尔提斯认为，聪明的梭伦，这位思想家、诗人和伟大的政治家的“最伟大的事迹”就是，他为了他的出生地萨拉米斯而带领雅典人向麦加拉人发动战争。雅典人几经失败后决定，谁再提议发动一场新战争，将被判处死刑，这时梭伦又煽动雅典人发起另一场战争。梭伦这位当时最聪明的人如果不认为军事征战是正常的事情，是符合雅典人的利益的，他就不会施展这样一个罕见的计谋。不难发现，希腊文化中的所有伟人实质上都持这样的看法。

赫拉克利特教导说，“一切事物都是由命运创造的”，“〔只有〕通过对立潮流之间的斗争”才能变得“和谐”，因为世界同时是对立面之间的和谐和斗争。此外，一切事情只有通过它的对立面才能为人们所公认。而且，“在这些对立面中，致力于新生和创造的对立面叫做战争和斗争，致力于用火破坏的叫做和谐和平”。赫拉克利特肯定知道战争的真正性质，但是，他颂扬战争，把战争视为最高的创造行为和一种社会—伦理原则。他说：“战争是万物之父，是人人之王；战争使一些人变成神，使另一些人变成人，使一些人变成奴隶，并使另一些人变成自由民。”

在赫拉克利特的时代，关于战争的性质可以从米莱图斯城

的命运中得出结论,该城在公元前 494 年反对波斯人的起义中彻底被毁。它所有的居民不是被杀死,就是被放逐到波斯。埃斯库罗斯本人就曾在马拉松、萨拉米斯和普拉塔作战,并写下了表达狂喜心情的诗来颂扬希腊人战胜波斯人。在他众多的喜剧和悲剧中,众神是正义的保护者和对罪恶的复仇者。后裔也是为先辈的罪行承受报复的对象。他的众神和英雄们的崇高行为达到顶点,但是他们的愤怒和罪行也达到顶点。

希腊另一位伟大的剧作家索福克勒斯也曾参加反对萨摩斯岛的战争。对于他来说,冲突和战争是神秘的厄运,他并不怀疑这种解决办法。相反,他把这种神秘在他的剧本中用作历史角色的样板,这些角色的本质完全是通过矛盾和暴力来表述的。在他的《安提戈涅》一剧中听到他说“有许多奇怪的事情,但是,没有比人更奇怪的了”,那是不会感到意外的。

没有伯里克利(公元前 495—429 年)<sup>①</sup>作为军事统帅的胜利,就不会有雅典的繁荣。决不能忘记,雅典的伟大不光是基于防御战,也基于残暴的征服战。伯里克利本人甚至在他获悉他的两个儿子已经战死之后还力促雅典人投身于战争。

恩培多克勒(公元前 490—430 年)<sup>②</sup>作为流放者亲身经过暴力,他被亚里士多德视为雄辩术的奠基人。他认为爱和憎作为不可分割的元素支配着一切,是一切事物的根源和起因。它们作为元素和力量,交替统治着,它们的和谐和敌对的周期从未停止过。

① 古雅典政治家、民主派领导人,后成为雅典国家的实际统治者,他的统治时期成为雅典文化和军事上的全盛时期。——译者

② 古希腊哲学家、诗人、医生,持物活论观点,认为万物皆由火、水、土、气 4 种元素所形成的,动力是爱和憎,爱使元素结合,憎使元素分离。——译者

苏格拉底作为雅典的一名年轻军人也是以骁勇著名的。后来他被判死刑时,他同样是勇敢的。对苏格拉底的审判是对任何时代有思想的人进行迫害的典型事例。苏格拉底思考正义和非正义问题,得出看法认为,真理和道德应当是相同的概念,没有人是故意犯罪的,因此罪只是一种过错。但是,他的理性的伦理观仍然受制于指导人一生行动的魔鬼的神秘的内心呼声。

与之相类似,德谟克利特(公元前460—370年)认识到,贪欲和激情可能主宰人。不过他还是相信理性的力量,相信善会战胜恶和暴力。幸福这个人生的最终目的只有通过精神平衡和心灵的宁静才能达到。这也反映在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哥拉(公元前481—411年)的著名命题“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之中。普罗泰哥拉认为,“任何事情都有两种彼此相反的说法。”这意味着真理不是某种独立和客观的自在之物,而是主观的感知,是某个人觉得如此的东西。因此,从个人感知的角度看,一切意见和看法都有可能是真实的。

柏拉图的经历——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雅典国实力的衰落、政治动荡、个别人和暴民的恐怖,特别是苏格拉底本人的悲惨命运——促使他设想出一种理想的国家和社会制度。他在他的《国家篇》和《法律篇》中陈述了这一制度。柏拉图为一切事物找到的解释是对立面的必要冲突:善和恶,正义和非正义,理性和非理性,法律和暴力。在柏拉图的哲学思想体系中,最高的是善,因为存在和变化的一切事物都寻求善的实现。不过柏拉图的伦理理想主义保持二元论的原则。他并不无视生活的恐怖和残忍。人无法逃避善和恶的永恒的宇宙范围的斗争,因为只有通过这一斗争才能达到整个的神圣和谐和国家的社会和谐。因此,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对于军人和斗士这个特殊阶级赋予特别高的荣誉地位,仅次于哲学家—统治者。斗士的唯一职责

是保护国家不受敌人之害,为此他们受到有关作战技巧的特殊教育和训练。柏拉图甚至认为武力和战争是必要和不可避免的现象。在他看来,只有希腊人和野蛮人之间的战争才可能是真正的战争,“后者就本性而言就是敌人”,而希腊人之间的战争不论如何血腥,也只是冲突或者摩擦而已,因为竞争者不是“天然的”敌人,而仅仅是对手。因此,在他充满空想的《国家篇》里,柏拉图明确地说,“正义没有意义,不过是强者的利益而已。”

柏拉图集中精力于理想国,而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一书中描述了希腊世界国家政治制度的实际情况。亚里士多德认为,对自身、对家庭和对祖国的爱,不是罪恶,而是人的有深刻根源的需要。这样的爱只有在夸大的情况下,以损害别人为代价,才变成罪恶。亚里士多德目睹了无节制的欲望、狂暴的动乱以及城邦之间为争夺优势而展开的冲突带给希腊公民的种种罪恶和不幸,他成了政治生活保持稳定和缓和以及“各不相容的极端”之间采取“中庸之道”原则的鼓吹者。像柏拉图一样,他也认为人的四个基本品德——勇敢、节制、正义和理性——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是同等地需要的。亚里士多德认为,生活是由斗争和和平、工作和休闲、有益的劳作和努力组成的。和平、休闲以及艺术是对生活的祝福,而战争、工作和劳动则是不愿看到但又无法避免的事。因此,甚至必须通过斗争手段来确保和平的休闲。为此必须训练公民勇敢地投身于战争以及高尚地过休闲生活。

人就本性而言是“社会动物”(政治动物),只有在一个共同体里,他才成为“社会存在”。然而,在人之间存在不平等、自由和奴役关系是自然而然的事。作为社会存在,人只有在一个共同体内才能实现他的幸福。国家是最高级和最有力量的共同体,因为它包括了其他一切共同体,并从每一个人那里和为了每

一个人谋取最大的善。亚里士多德认为,由于一切共同体都各有目的,都谋求某种善,因此,他认为一些人得自由,另一此人受奴役是自然现象。他援引诗人们的话说:“希腊人正当地统治野蛮人。”他认为,希腊人天生注定是自由和统治的,而一切野蛮人(非希腊人)则注定要成为奴隶。从这个事实出发,亚里士多德还觉得,战俘依照法律成为奴隶是天经地义的。这表明,他认为战争暴行是正常的,甚至是有意义的。

希腊人很久以来就认为希腊人是例外,“野蛮”民族的臣服是天经地义的事,亚里士多德则把这种看法发展成从理论上为帝国的扩张主义辩护。马其顿的腓力二世邀请亚里士多德任他儿子亚历山大的教师,这决不是偶然的。当亚历山大(纪元前338年)参加海罗尼之战,击败雅典和底比斯时,亚里士多德仍然是亚历山大的教师。

雅典方面参加这次战役的人之一是狄摩西尼(纪元前384—322年),他以发表《斥腓力》系列演说而闻名,他的这些演说反对马其顿王腓力二世,指责他是征服者和希腊自由的破坏者。狄摩西尼力促雅典联盟大力抵抗马其顿的征服,但失败了。古老的希腊城邦被打垮,马其顿成了更大的强国。事实上,亚历山大大帝统一了希腊世界,随着他在中东和亚洲的征战,暂时扩大了马其顿—希腊的统治,而长远地扩大了希腊文化。亚里士多德没有陪同亚历山大去东方进行军事远征,而是回到雅典,后来,在亚历山大死后,他又不得不逃离雅典。这些事例不过说明他人格的双重性,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关于世界的哲学思维和政治家的征战活动两者之间是不可能持久和谐的。这还表明,历史不会忘记为本国人民的敌人服务的任何人。伊壁鸠鲁属于对欧洲哲学思想随后的发展施加了格外的影响的希腊伟大哲学家之列。卢克雷蒂乌斯·卡鲁斯(纪元前96—55年)在过了两个

世纪之后,在罗马继续发展伊壁鸠鲁的启蒙哲学,说“他的智力超越了全人类”,甚至两千年以后,仍有巨大影响。伊壁鸠鲁认为,一切事情的目的和最终目标必须是人的幸福,只有了解并尊重自然法则才能实现人的幸福。大自然、生活和世界上的万物都有其典型。事件都是必然性产生的结果,必然性是作为一种不可调和的力量起作用的。不过,有些事件是偶然发生的,而另一些事件则是我们自己促成的。因此,“未来并不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也不完全不取决于我们的意愿”。伊壁鸠鲁认为,“公正从来不是在绝对的意义上存在的”,只是作为有关相互关系的一项协议而已。不能同意“不伤害他人或者不容忍伤害他人的人,既不懂得公正,也不懂得不公正”。他认为,这也适用于“不能达成不挑起伤害或者不容忍伤害协议的民族”。问题的实质在于“不公正本身不是罪恶,而是后果体现了罪恶”,在于每一个共同体都遵循这样的规则:“对共同体有益的就是公正的。”

伊壁鸠鲁鼓吹通过与共同体分开,通过心灵的宁静和个人生活的满足,以及通过致力于用智慧克服痛苦和罪恶来谋求幸福。他认为人的意愿的无能为力和无法改变历史和社会的实在——在这种实在条件下,人和民族同意相互克制,不施行暴力和伤害——仍然几乎是一个无法达到的目标,是一个罕见和通常是短命的现象,在历史的整个行列中只是转瞬即逝的一刻罢了。

马其顿王腓力二世于公元前338年在海罗尼战胜雅典—底比斯联盟,标志着希腊城邦时代的结束,但是并不标志着古希腊文化的结束。腓力二世不是作为征服者,而是作为反波斯人战争的领袖承担起了希腊诸国联盟的领导责任,帮助创造了推广古希腊文化的条件,他儿子的军事远征进一步推广了古希腊文化。亚历山大的世界国不可能像早些时候的古希腊诸国那样具有同样的目的,其构成和活动也不可能是相同的。世界变得越

大、越具普遍性，人对自然和空间的感觉就越强烈，对国家更令人敬畏的武装力量和暴力的增加，也就感到更加孤独无援。这反映在斯多葛哲学的看法中，这一派哲学是塞浦路斯人芝诺（公元前366—264年）创建的，又为罗马的思想家们进一步发展了的。这位斯多葛派思想家面对一个他的影响很小的世界，谋求的解决办法是使他自身精神存在的力量上升到超过他无法改变的存在的条件。

随着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野蛮人被赋予了成为希腊人的权利。这样一来，古希腊文化通过把国家—政治的优势强加于人，通过推广希腊的文化和语言，实质上同化了非希腊人。古希腊文化无疑可以成为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例子，说明默认暴力是历史的一个正常的因素。但是，古希腊文化也可以被看成是一个证据，证明试图把历史上众多的民族同化成一个民族是徒劳的。这是亚历山大帝国在他死亡不久即崩溃的主要原因。当希腊成为强大的罗马帝国的战利品时，同一些因素决定了罗马帝国的命运。

古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的帝国时代所产生的独树一帜的哲学思想家和历史学思想家要比先前各个时期要少，在军事战略和国家行政领域是例外。罗马人的思维开始于希腊，但是，罗马人的思维更多地考虑的是实际问题，而不是理论问题。

罗马史中最出名的格言之一是败者该遭殃！这句话实际上是高卢人领袖布勒诺（公元前387年）说的，但是，伟大罗马帝国的整个历史就表明了这句话的含意，这就是：它的制服外国人民的一次次征服战争，它的频繁的内战以及被征服的民族和奴隶的各次起义。事实上，罗马史是一部不断的冲突、武装袭击和惨痛的冒险的历史。

这促使罗马诗人和哲学家卡鲁斯乞灵于维纳斯女神的神力